

兰州财经大学

高教研究与信息参考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19 期)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编

2021 年 4 月 16 日

本期目录

☆高教要闻

- 教育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教育的基本主题
- 教育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以西安兰州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
-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
- 夯实教学新基建 抓好三质量一水平

☆专家视角

- 瞿振元：中国特色道路 世界一流水平
- 徐飞：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
- 别敦荣 易梦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

☆政策解读

-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工作答记者问

☆高教视点

- 破“五唯”后，高校职称评审如何才能更见实效
- “七问”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 为地方高校指明办学方向

☆高校动态

- 东北石油大学：多措并举让毕业生求职更安心
- 中国政法大学等 13 所高校实现思政课程共享

☆高教要闻

教育部：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教育的基本主题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2021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民表示，在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重要历史时期，教育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加突出，因此，“十四五”期间将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基本主题。

宋德民指出，在推进过程中，要以体系建设为抓手，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一是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推动从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二是构建支撑技能社会建设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普遍实行“1+X”证书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切实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三是构建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结构、强化内涵，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四是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多渠道扩大终身教育资源，更好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学习需求。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3-31）

教育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以西安兰州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

2021年3月3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去年9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进行回应时指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下一步教育部将主要做好六件大事。

一是要建平台。教育部将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的创新综合平台，共建共享优质的教育、科研、人才资源。

二是要推集群。以西安、兰州为战略支点，要发挥高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带动引领西北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要以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发挥高水平大学和高等教育集群的集聚溢出效应，打造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三是要优结构。要支持中西部高等学校聚焦区域发展急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打造特色优势专业，升级改造传统专业，淘汰一批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

四是要强协作。要加大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工作力度，建立东中西部高校全国性对口支援的对接平台，精准实施对口支援。

五是促共享。要深入推进“慕课西部行计划”，加大对西部高校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供给力度。

六是惠民生。要持续推进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的免费培养工作，每年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输送 6000 名以上“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全科医学人才。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1-4-1）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

为扎实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于近日印发《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规范》明确了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的总体要求，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业务需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智能技术，实现高等学校在信息化条件下育人方式的创新性探索、网络安全的体系化建设、信息资源的智能化联通、校园环境的数字化改造、用户信息素养的适应性发展以及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规范》指出，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应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总体设计、标准引领，应用导向、数据驱动，注重融合、体验优先，安全可靠、适度超前，积极探索、创新应用的建设原则，按照整体规划、总体设计、项目建设、运行维护、评价改进的建设流程推进。

《规范》对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各方面的内容提出了通用要求。基础设施方面，应确定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性能和容量等指标，选择主流和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和设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基础设施安全等。信息资源方面，应对学校信息资源建设内容、标准规范、建设方案、技术平台等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参照信息资源已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各类信息资源的学校标准，将相关的标准规范落实到具体的工作流程、业务规范和技术平台中，推进和鼓励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创新应用等。信息素养方面，应融合线上与线下教育方式，开展以学分课程为主、嵌入式教学和培训讲座为辅、形式多样的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应用服务方面，应遵循应用驱动、数据融合的原则进行建设，支撑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交流合作、文化传承等业务，为师生校园生活提供智能化服务。网络安全方面，应确保基础设施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终端安全、数据安全和内容安全等。保障体系方面，应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学校统一完备的规章制度、稳定专业的技术队伍、统一规范科学且具有强制性的技术标准、稳定的经费投入、规范的经费管理办法、持续稳定的运维服务和科学完善的评价标准与体系等。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1-3-26）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 夯实教学新基建 抓好三质量一水平

2021年4月1日，2021年全国高教处长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本次会议对高等教育相关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要求各省(市、区)教育厅(教委)、各高校、各教指委委员要把握新发展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把教育作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要素和内生变量，发挥好国之战略重器作用，

加快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实现支撑高水平自立自强创新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力、塑造国际合作优势的竞争力、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持续力、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满意率全面提升。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夯实教学“新基建”托起培养高质量》主题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根本与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专业、课程、教材和技术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新基建”，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好专业质量、课程质量、教材质量和技术水平，实施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攻坚行动，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深入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深化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强化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办好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深入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吴岩强调，全国高教处长会自2018年首次在东部省份江苏南京召开，到2019年在中部省份河南郑州召开（2020年受疫情影响，以在线方式召开），再到今天在西部省份陕西西安召开，就是要使本科教育发生格局性变化。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1-4-1）

☆专家视角

瞿振元：中国特色道路 世界一流水平

2015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自此，“双一流”建设拉开帷幕。这既是“211工程”“985工程”的平稳延续，更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擘画，是党之大政、国之大政。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着眼于“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路线图；确立了“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

四个基本原则；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部署了五项建设任务和五项改革任务，从整体上描绘了“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蓝图。

根据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实施办法，组建专家委员会。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认定137所高校和465个学科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从中央到省区市，从政府、社会到高校，很快形成巨大合力，形成上下贯通的管理和建设体系。中央引导专项资金、地方政府投入共计1800余亿元陆续到位，建设高校筹资2000多亿元。

今天，“双一流”建设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具体体现在：

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得到加强。党委对“双一流”建设全面全过程领导，基层组织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领导和保障作用，“双带头人”作用发挥明显，党的模范作用在“双一流”建设中得到体现，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意识显著增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137所“双一流”高校只占全部本科院校数的10.8%，却承担着全国80%以上的博士生、50%以上的硕士生培养任务，本科生招生量只占全国的14%。显然，这些高校承担着培养国家需要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以研究生教育为高峰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加强。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按照“四个面向”调整学科布局，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在国际科学前沿领域，建设高校瞄准世界一流水平，表现更趋活跃，赶超步伐不断加快。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核心技术研发都有“双一流”高校的重要贡献。在国家科技三大奖中，“双一流”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数超过全国总数的一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双一流”高校更是发挥着主力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全面加强，高端智库建设快速发展，一批重大学术文化项目由“双一流”高校负责组织实施。“双一流”高校在第八届全国高校科研成果（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中斩获80%多的奖项。

教师队伍建设明显提升。“双一流”建设对领军人才的集聚效应十分明显，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有全球影响力的

学者数量显著增加，一批青年学者崭露头角。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成效明显，“双一流”高校拥有的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都占全国总数的70%。

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双一流”高校与世界顶级大学和科研机构组建57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数千名在校生在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以学历生为主体的在校留学生从2016年的13.6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7.3万人，其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数量增长近40%。“双一流”高校的世界影响力大为增强。

“双一流”建设有力带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各省级人民政府都将国家“双一流”建设纳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框架，建设了一批地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一个多层次、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新格局正在形成。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奋斗的历史过程。即使一些可比指标与世界名牌大学接近了，但还存在不少非可比指标方面的差距。只要我们遵循规律、深化改革、静心建设、久久为功，我们的追求一定能够实现。

（瞿振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4月2日第5版）

徐飞：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

“新文科”是最近教育领域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上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并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新文科”新在哪里？又该如何建设？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徐飞教授给我们带来相关思考和解读。

新文科之“新”

新文科之“新”不仅是新旧、新老的“新”，更是创新的“新”。换言之，不仅是形容词的“新”，更是动词的“新”（创新）。唯如此理解，方能把握“新

文科”的本质和核心要义。以下从论域拓展、价值重塑、话语主导、交叉融合、研究范式这五个维度，阐述新文科之“新”。

新在“论域拓展”

新文科的论域包含内涵和外延。我国的学科门类现已拓展为 14 个，除了大家熟知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这 13 个学科门类外，近期又新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分别属于工学、医学、农学中单一的一个学科门类，新文科则不然，包含 8 个学科门类：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其中，文、史、哲是基础文科，经、管、法和教、艺是应用文科。因此，新文科的外延和范围大大拓展了。

一般而言，所有学科可以分成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分别以“物”“事”“人”为研究对象，追求物理要“对”、事理要“明”、人理要“通”。由上陈述可知，新文科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再次说明新文科范围之博大。之所以强调“物”“事”“人”三类研究对象，就是要揭示新文科内涵的根本因素——人。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社会科学虽然研究的是“事”，但事因人而起，天下无无关人之事，因此其本底还是“人”。

不过，现在除了“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代表之一智能机器人，正在对“人”的概念产生新的影响，人工智能亦大行其道。2011 年，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 在《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 一书中，就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分成“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他甚至大胆预测，到 2045 年机器人智力将超过人类。2017 年 11 月 29 日，名为“索菲娅”的机器人“公民”在沙特阿拉伯横空出世。索菲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为一国公民的机器人，沙特还给“她”颁发了居民身份证。作为以研究“人”（及其相关的事）为对象的新文科，由于“人”的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涵也将随之拓展并极大丰富。

新在“价值重塑”

文科与自然科学都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和学术性，但文科还必须关切并体现价值性和思想性，价值性、思想性和知识性、学理性相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脉。一般而言，自然科学注重工具理性，文科则注重价值理性。众所周知，工具理性具有客观性、普适性和普遍性；价值理性则具有主观性、民族性、历时性、理念性和意识形态性。新文科的着力点需从探讨人文社科所涉对象的规律性，转向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需注重揭示理性背后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弘扬知性美德和善意，为理工科乃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思想指引与价值选择。

价值重塑，需要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人类不自觉地奉行“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爱惜地球家园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淡薄。殊不知伤害人类的，终究是人类自己。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再丰厚，也取之会竭、用之会尽，人类必须懂得尊重大自然，若索取无度，终将遭到大自然报复。因此，必须重塑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价值重塑还需要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解”，找回人类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比如，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虽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也让一些人再次陷入（理性）自负。现实生活中理性退化为算法和计算，计算甚至蜕变成算计。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极可能被日益强大和精准的算法所主导甚或“绑架”。由此推论，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附加带来的环境、生态、伦理等风险，以及个人精神迷失、信仰空缺和意义危机等问题，这些都亟待通过新文科实现价值重塑。

新在“话语主导”

若用大时间尺度看世界历史，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思想、科技、制度均在西方之上。但是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并日益取得强势地位。

新文科应助力文科转向中国话语体系主导之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量级学者群。新文科要讲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事理，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管理学界逐步完成国际接轨，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快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当下，本土学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扎根中国经济管理实践，充分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日新月异的管理变革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问题导向捕捉管理变革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机会，深刻反思本土情境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规律，进而兼收并蓄，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经济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方法和新范式，这应是新文科的一个重大使命。

新在“交叉融合”

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体现在：传统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文史哲不分家）；传统文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学（P）、政治（P）、经济（E）“三位一体”；文科与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与气候经济、设计艺术哲学、新媒体；文科与医科交叉融合，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信息学、健康管理；文科与农科交叉融合，如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农业经济学；文科与理科交叉融合，如计算法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商业智能，等等。“新文科”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

仅以财经为例，现在财经研究除了利用数学、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之外，越来越多地综合利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行为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实际上，商业分析（BA）和商业智能（BI），就是集商业管理、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于一体的商科与理工科紧密交叉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社会行为经济（SBE）学部，在2010~2020年学科发展战略报告《Building the Mosaic》指出，未来10年学术研究特点是：数据密集（Data-intensive）、跨学科（Transformative）、强合作

（Collaborative）、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这四大特点都指向SBE的交叉融合：数据密集（泛在）自不待言，跨学科和强合作几乎就是交叉融合的同义语，而问题驱动则是倒逼交叉融合，因为没有哪一个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考量、协同施策，方能解决问题。

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在方法论上，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应转向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特别是要运用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计算社会科学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CSS)就是用计算手段来研究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打造“数智人文”。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创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愈发鲜明，将井喷式地出现计算传播学、计算新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经济学、计算金融学、计算管理学、计算政治学、计算行为学、计算心理学、计算语言学、数字情报学、数字人类学、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学科。

新在“研究范式”

新文科研究范式将不断丰富。

以管理学为例，一是基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以概念抽象、学理思辨及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规范性研究；二是基于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以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案例研究、经验分析、田野调查、随机实地实验(Random field experiment)等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究；三是基于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聚类分析、人工智能(AI)等学科，以数学建模、模拟仿真、数据挖掘为主要特征的量化研究。实际上，根据图灵奖得主 Jim Gray 的观点，科学研究经历了从“实验归纳”，到“模型推演”，再到“仿真模拟”的三次范式革命，现在方兴未艾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正是演进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得益于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等学科的飞速进步，我们现在已知“前额叶”成熟需要大量复杂的学习与综合训练，这些学习与训练的程度、方式与强度对前额叶成熟程度有重大影响。而且，前额叶成熟指标(理性)涉及注意力集中程度、组织思想解决问题、思考与预期未来、战略与计划、平衡长短期目标为长期目标延迟短期享受、根据情景调整行为，以及管理情绪控制冲动、处理复杂信息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学习适当社会行为和抵制不

适当社会行为等。这些认知对企业管理、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大有裨益。一般地，综合应用上述多学科知识，无疑可以为新文科打开一片新天地。

如何建设新文科

新文科建设需要构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这四大体系，并在强化价值引领、打造数智人文、彰显文科“质性”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建构四大体系

我认为，新文科需要明确新定位、新理念、新理论、新学科、新方向、新专业、新课程、新模式、新标准，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科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

建构新文科理论体系，应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把握已来，面向未来。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厚植华夏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着力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又要借鉴汲取世界各民族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理论成果和最佳实践，坚持守正创新，贡献学术新知和学理创见，不断扩展人类的知识疆域和理论边界。既要观照现实生活，回应社会关切，反映时代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从当代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深刻解读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解决当下问题；又要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为新时代理论创作和学术研究开辟道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建构新文科学科体系，一方面应遵循不同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分类推进。文科门类众多特色各异，要根据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促进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学科门类特色发展；另一方面要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审慎地推进文科内部以及文科与理工科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搭建学科集群平台，打造学科群协同共育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培植新兴学科，传承和发展传统学科的知识体系。学科的本质是人类学习知识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学科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知识规训，并遵从严格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研究范式开展知识生产和学术创建活动。

建构新文科教学体系，其重点工作，一是持续做好现有专业、方向、课程的更新、优化、改造、提升和赋能，同时加快新专业或新方向、新课程的探索与增

设。鼓励跨学院联合建设新专业，激励教师开发新课程，新旧课程应形成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覆盖并体现该专业（学科）既有和前沿的发展实践。二是推动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开展本硕博长学制贯通式培养，积极推进双学位、主辅修、微专业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跨院校、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育人机制。三是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经典“悦读”活动，使学生能从经典中邂逅高贵灵魂，感受非凡智慧，洞见深邃思想，进而品味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以充分发挥文科经典独特的浸润、熏陶、感染、共情、唤醒、激发教育作用。

建构新文科评价体系，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需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改善制度供给，破除唯项目、唯经费、唯奖项等顽瘴痼疾，健全综合评价、分类评价、多元评价和同行评价，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以及建言资政和人才培养贡献度，探索将学术会议、论坛报告、调研访谈、趋势研判、决策咨询、教学教研、课程思政、创作作品等方面的高品质成果，像高水平著作、论文一样作为新文科代表性成果。对通过交叉融合产生的“交叉（新）学科”，要突破传统的学科评价框架，全过程按照独立的交叉学科为单位进行管理，避免同行专家仍然用传统学科思维左右评价结果。

强化价值引领

士以弘道，文以载道。如前所述，学术性、知识性与价值性、思想性相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脉，强化价值引领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首先，从社会思潮看，新文科需要切实肩负“精神补钙”和匡正人心的重要职责，做社会的弘道者，承担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秩序看，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和制度的竞争。国家力量和有关各方的角逐，将越来越围绕真理道义和是非曲直标准的不同理解而展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而新文科在推动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多赢、共荣的国际秩序上大有可为。

从科技伦理看，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问题一直与近现代科技进步形影相随。在科技史上，炸药、原子能、化工技术、造纸技术、纺织技术、基因工程、人工

智能等，在给人类创造财富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战争工具、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甚或生命尊严丧失和生活意义消解。历次工业革命的进程表明，每次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生产力革命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并带来法律、文化、观念、理念、秩序等精神和价值层面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也亟待新文科做出及时回应，以弘扬科技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造福人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打造数智人文

当前，新文科建设中风头最强劲、发展最迅猛、成就最显著，也最被看好的当属数智人文“Digital-Intelligent Humanities (DIH)”。数智人文从“数字”到“数智”，从简单的数据仓储建设和编辑，到开展统计处理（计算机语言学）、运用链接（超文本）、建模（包含结构构建与视觉呈现）、创造结构化数据（可扩展标记语言），再到新的整合性实践，一路走来风生水起，为新文科提供了跨学科交流平台和新的研究工具，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力，推动学术机制的重组（构）和再造。

数智人文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导向，其产生和推进都源于“数智”和“人文”的双向需求和动力。一方面，激励当代数智人文发展的核心信念，是坚定地相信数字化智能化工具具有转变人文学探索内容、边界、研究方法和受众的巨大潜能。历史上笔、纸及印刷术的出现，都曾为知识和学术思想的生成和传播创造了新条件。如今信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新的记载、阅读和研究方式，及时开启印刷时代向数据时代的转向正当其时。比如，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依赖定性分析、数据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利用谈判文本或政策文本进行聚类分析、知识图谱、情感分析等定量深层挖掘，可以显著提升研究水平。

另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以后，文科学术界一直面临着学术创新的压力，作为特别需要积累和传承的人文学科，亟待拓宽学术空间，激活学术潜力，数智人文就成为重要的尝试路径。以历史研究为例，通过文本图像分析研究平台和结构化智慧数据（Smart Data），可以实现数智和人文的联系，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交融，这不仅延展了观察历史的平台，深化了学术内涵，还能用“可视的”

方式呈现历史时空和时空里活动的相互关联的人与事,使学术境界有可能获得根本性提升,进而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形成新的研究契机。

未来数智人文可在以下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诸如:数智人文的基础理论,信息技术与数智人文学科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式融合带来的认识论挑战;语义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链接数据)以及数智人文领域的相关技术应用;数智人文的研究方法和方法创新,数智工具和平台是如何塑造(有潜力影响)人文学者工作、进行研究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及其相关含义,人文学术、传统和实践如何塑造或有潜力塑造数智工具、平台及其创新;数智人文教育模式、课程、方向、职业和能力的研究,以及多元化合作的方法等。

彰显文科“质性”

众所周知,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研究现象发展过程及其特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体性探究,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此处我借用“质性”这一术语,不仅是再次强调文科内在的、内涵的思想性和价值性,更意在提示和警醒新文科建设中不要追求“新”而忽视“文科”本身。

毕竟,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文科”是“道”“体”和“质”,“新”则是“术”“用”和“文”(纹)。彰显文科“质性”,就是要在新文科建设中突出文科自身的中心地位。近期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是其下设的两个一级学科。在我看来,如果说“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是地道的理工科,“国家安全学”则是新文科。国家安全固然要靠高科技和“撒手铜”等硬实力和锐实力,但也要具有集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对策博弈、运筹帷幄于一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如前指出的那样,新文科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然而,多年来重理轻文、重定量轻定性(质性)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若不注重文科质性,新文科中的文理交叉或将“喧宾夺主”导致文科愈发式微。因此,文科自身更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徐飞,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3月20日)

别敦荣 易梦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及其建设策略

质量文化是近年来高教界出现的一个热词。质量文化及其建设是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过程中，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审核评估和有关认证工作中，从上到下充满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切。尽管质量文化为高教界领导所重视，高校干部教师在各种报告和文件中经常读到，也经常谈到，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却还不够清晰和深入，在质量文化建设上也难说举措适当、应对自如。实际上，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本身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存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更增添了领会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精神实质、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难度。新近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办法（2021-2026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单列为审核要素，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开始迈进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完善制度延伸到建构文化，从注重“制度约束”过渡到强调“文化自觉”。尽管这种转变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趋向，但它也给高教界带来更艰巨的任务，需要人们更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理解质量文化的性质，明确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

质量文化为人所重视只是最近的事情。毫无疑问，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由来已久，在保证和提高质量方面采取了诸多政策和措施，有的质量理念和相关政策措施在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坚持了下来，成为传统和习惯，但质量文化并没有引发人们的关注。在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人们开始从文化角度认识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质量文化概念并受到重视，成为相关政策的重要主题。但客观上讲，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还有待厘清。

1.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涵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能脱离高等教育文化。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现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也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围绕高等教育

质量所形成的理念、信念、价值及由此所衍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关制度、行为、惯例和物化载体的有机体。它既有广狭义之分，又有宏微观之别，还有精神与物质的不同表现方式。

(1) 广义和狭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文化总是附着于一定的社会现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附着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有广狭义之分，质量文化也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高等教育是指师生所建构的教与学活动及其过程，师与生、教与学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他要素都为实现师生教与学目标服务。因此，狭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师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所奉行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活动中所沉淀和积累下来的规则与惯例的总和。也就是说，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可或缺的主体，质量文化扎根于师生内心，表现于教学活动，分布于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学质量，是最深层的高等教育质量决定因素。

广义的高等教育是指社会或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往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政府施政治国的重要领域。因此，广义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国家高等教育部门所存在的质量文化，既包括狭义的质量文化，又包括政府和社会参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秉持的价值追求和积淀下来的稳定的作用方式。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师生，又包括高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等；高等教育质量价值是多元的，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体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强势主体的作用对质量文化生成和变化具有主导作用。

(2) 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高等教育是特定组织机构的职能。一所高校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往往被看作是微观的，而多所高校或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高校所开展的高等教育则被认为是宏观的。因此，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要是指一所高校所形成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质量生成和保障制度、活动规范要求等。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它所遵循和实施的高等教育政策、所追求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直接影响各学科专业的高等教育活动，影响师生的教学过程。时间一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便形成了。这就是说，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高校组织文化的一部

分，与高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它不仅与高等教育质量生成不可分割，更是质量保障的基石。

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微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由微观的质量文化所构成，微观的质量文化是宏观质量文化的基因。正如个性与共性的差别一样，个性的质量文化属于具体的高校，共性的质量文化则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高校所共有的质量价值追求以及相关规则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一定区域高校共同遵循的质量价值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规范和工作要求。这里的区域可以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行政区划的。地理上的往往与一定地方的文化相关，比如，东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北地区的文化对当地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有重要影响；行政上的往往与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相关联，比如，上海市对全市高校的高等教育发展有自己的规划，对全市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与其他省市自治区存在差异。当然，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对全国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不仅有标准，而且有持续的评估督导，这对于全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精神和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比如，理念或价值观，但也有物化的表现形式，比如，建筑文化，即建筑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价值取向，一如宫廷建筑所代表的庄严、恢弘和大气，寺庙建筑所表现的虔诚、肃穆和寂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也是如此。就精神而言，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指高等教育质量观所包含的价值取向。质量上的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体意志的体现，不同主体的组织性质不同，高校、政府、社会其他组织和民众之间的差异很大，他们在高等教育质量上的诉求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也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内容。不同主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政府主要通过相关政策的高等教育价值指引来体现，高校通过自身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改革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价值选择来反映，社会其他组织或通过舆论或通过对学生毕业生的要求来表达高等教育价值评判，民众则主要通过求学意愿来实现自身的高等教育价值要求。在以知识为目的的质量价值取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是围绕知识授受所发展起来的一套办学规范和行为

活动要求；在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质量价值取向，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包含了更多的与社会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学的制度和教学活动要求与惯习。

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精神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可分割，没有精神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就不可能有物质的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存在。物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主要指高等教育活动中所利用和产生的体现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及其实现状况的物化存在。一方面，这种质量文化存在于高等教育过程中，服务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表现为教育教学环境条件。比如，教室和教学设施都是开展高等教育活动所必需，它们不是普通的物质条件，而是包含了高等教育价值追求的物质条件，智慧教室与传统教室所包含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不同，多媒体教学设施与传统的电化教学设施所追求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存在差别。毫无疑问，这些建筑、设施条件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它们承载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评价与选择，又被用于实现人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追求。再如，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高楼大厦和庭院环境所承载的文化理念殊异，高校的选择往往包含了对质量的倾向。另一方面，物质的质量文化还可以是高等教育过程中所开展的活动及其结果的物化形式，比如，培养方案、课表、课件、讲义、实验报告、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决议书等。这些记载教学过程中师生教学行为与成果的实物有的体现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的追求，有的反映了价值追求的结果。

（4）持续改进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维新的，它的目标指向是更高的质量、更强大的高等教育。持续改进既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内在品质，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机制。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保持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且不断走向壮大，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再向普及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拥有质量文化所蕴含的持续改进的强大动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质量价值诉求相结合，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现实需要，促成了各种内外部质量评估、督导和认证工作的开展。不同主体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博弈是持续改革的动力源泉。

2.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同时产生，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变化而不断演进。不论人们发现与否、承认与否，它都在那儿，历史的印记层层叠加形成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时代特征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展现出现实的适应性。

(1) 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

质量文化产生于高等教育活动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因为只要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过程是连续的，那么，质量文化就是连续积累起来的，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为质量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使质量文化出现累积效应。即便高等教育发展出现断裂，质量文化也会“记录”断裂的痕迹。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不论高等教育历史有多久远，质量文化积累有多深厚，它既要影响现实高等教育及其质量生成，又要将现实高等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质量价值与规范沉淀并加以吸纳，使自身的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高等教育发展常常不是直线性的，发展历程可能出现曲折回流，质量文化也会随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而打上相应的烙印，还会表现出层次感，将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观与相关惯习展露无遗。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经验，有的高等教育理念和体制机制可能被移植到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这样的情境中，质量文化也会发生迁移或飘移，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发挥作用。

(2) 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主体。

尽管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但所有的质量文化都只有在高校扎根，才能影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很多，高校才是形成和发展质量文化的关键，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努力必须通过高校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比如，从世界众多国家的实践来看，不论采取何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有的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有的采取间接干预的方式。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都需要经过高校的转化，才能真正影响高等

教育，政府所倡导的质量价值和要求才能指导高等教育活动，从而融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温床。高校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建制，高等教育所赖以发挥功能的学科专业是由高校创建的，教师是由高校聘任的，学生是由高校招收的，所有人才培养活动都是由高校组织或牵头组织开展的。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以高校为组织单元发展起来的，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都需要经过高校筛选才能内化到学校组织文化中去，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并非只有高校一个原生源流，而是具有多源性。

(3) 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直接创造者。

高等教育质量的本意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上。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不仅成就了学生的发展，而且他们的活动印记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源泉。在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中，查阅教学档案是人们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比如，教学大纲、实验手册、学生试卷、毕业论文（设计）等档案资料是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历史文献，查阅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人才培养过程情况，窥探高等教育质量特点。不论是高等教育教学活动还是教育教学档案资料，都是高校师生的杰作，是他们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作出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是师生创造了高等教育文化，其他主体可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质量文化作出不可或缺贡献，但他们在质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不可与师生相提并论。

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春风拂面、润物无声式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师生的每一次教学活动、每一次交流互动都具有文化意义，师生的行为不但是在发现教育的意义，而且是在塑造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师生所践行的高等教育质量价值观可以源自他们自我的发现和领悟，也可以源自高校的办学要求、政府的政策精神、社会其他组织的期望和公共舆论的呼吁。这些高等教育价值观只有为师生所认同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贯彻落实，才可能沉淀而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相关的自然人群体很多，比如，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社

会民众尤其是家长、企事业单位有关领导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都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所有相关的自然人群体中，只有师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造的亲历者。

(4) 质量评估和认证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新发展的推进器。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具有发展性，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高校运行中，质量文化进行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积淀是质量文化形成的基本机制，看似平淡无奇的高等教育日常活动，日积月累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留下印迹，在高校相关规章制度和环境条件上打上烙印。

高校办学受到校内外诸多组织机构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受到多方的关注。政府在其中具有重大影响，它的身份及其所拥有的高等教育管理和治理权力，使其对高等教育质量不能不高度重视，并采取权威性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和规范高校办学，以达到其所希望的办学目的。正如格里纳(F. M. Gryna)所说，文化不属于技术范畴，但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这种质量文化。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政府探索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尤其是21世纪以来，推动了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高职高专院校办学水平评估制度的建立。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建立专业认证与评估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丰富了质量文化的内涵。质量评估和认证理念已经为高校所接受和认同，以评促建、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价值观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意义

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土壤。优良的质量文化能够孕育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相反，低劣的质量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质量文化的形成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自然天成，二是有意作为。前者是指师生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质量文化，后者主要指在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下，师生受各种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改变教育教学行为，从而导致新的质量文化的生成。这是一种主动作为、有意建设的质量文化发展方式。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质量文化建设成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大规模发展的重点战略，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概而言之，质量文化建设主要有两

方面的意义：一则是本体意义，一则是社会意义。二者是统一的，分而析之只是为了更深入清晰地认识质量文化建设的意义。

1.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本体意义

质量文化建设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施、为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发展服务的活动。质量文化不可能脱离高等教育而存在，质量文化建设工作也只能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施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达到建设目的。所以，质量文化建设的要义在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这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本体意义。

(1) 质量文化建设是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精英化阶段少有质量文化建设，高等教育发展超越精英化阶段后，质量文化建设愈益受到重视。规模扩大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第一特征，规模扩大必然带来生源的多样化以及求学意愿与目的的差异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不但会造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变化，而且质量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转化将支持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只有 70 余年，而精英化高等教育虽然只占适龄人口的 15%，且在精英化阶段适龄人口的数量比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要少得多，但它的发展历史却要长很多。如果说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比较多地表现为自然天成的话，那么，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各方越来越利益攸关，所以，质量文化建设成为高校、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任务，它也是实现各利益攸关方高等教育质量价值的重要路径。

高校和社会各方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主要是为了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多样化，这既是受教育者社会背景和求学意愿的反映，也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不可能自动获得，它离不开高校和社会各方的积极行动，也就是质量文化建设。20 世纪后半期众多国家和地区创建高职院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但使高职教育文化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成为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并走向普及化的可靠保证。纵观世界，尚未发现哪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过程中没有开展质量文化建设的。比如，美国建立了多元化的认证制度，使质量认证文化嵌入了高等教育，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

展中质量底线的保证奠定了基础。英国改组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并不断完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制度，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政府财政拨款相关联，不断提升了高校办学的质量意识，而且使教学评估、研究评估、质量审核等成为保证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

(2)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大抓手。

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关键组织主体。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就会有怎样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质量文化建设可以塑造高校的办学特色。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高校类型和特色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众多需求的刺激下，高校很可能觉着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能忽视或放弃，从而迷失自我，徘徊于各种需求之间，摇摆于各种办学定位之间，不能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质量文化建设有助于高校增强办学定力，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持续不断地累积组织文化，厚植文化传统。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后，几乎所有高校都会面临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办学需要的问题。高校即便确立了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但要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培育鲜明的办学特色，并不容易。质量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保证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还能不断强化高校组织文化，使学校文化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规范教职员工的办学观念，调节他们的办学行为，聚合人心，使学校办学方向不发生偏移或错位。比如，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在经历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转型发展后，尽管办学规模扩大了，学科专业门类和数量增加了，生源的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学校功能也拓宽了，但并没有改变自身基本的办学方向，而是保持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它能够有这份办学定力，与质量文化建设不无关系。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

(L. Summers) 曾说道：“保持哈佛的强大，需要精心地维护和强化致使我们长盛不衰的法宝：保持开放与质疑、探索与服务、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以通识教育传统为例，哈佛大学通过持续不断的质量文化建设，强化通识教育传统，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1945 年时任校长科南特 (J. B. Conant) 指派一个委员会对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形成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加强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以培养有责任的良好社会公民。1978 年

时任校长博克(D. C. Bok)组织专门委员会围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进行调查研究，发布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决定实施核心课程计划(core curriculum)。为了适应21世纪的需要，哈佛大学决定用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取代实施了近30年的核心课程计划，2007年《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提出了新的课程设计，将1978年实施的涵盖7个领域的“核心课程”重组为8个，包括审美和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和世界中的美国。

(3) 质量文化建设有利于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

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是高校办学的内动力。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其损失和影响远远大于经济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经济生产质量问题尚可弥补，高等教育只要出现质量问题，就具有不可逆性，贻误个人前途，影响家庭和社会。所以，高校举办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是与生俱来的使命。

质量文化建设是维新的。质量文化建设，不论是来自政府的要求，还是来自社会舆论或工商界的要求，抑或是高校自身所动议开展的，都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国政府持续开展的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是一场重要的质量建设运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进程中，既发挥了保证底线质量的作用，又发挥了提高质量的作用。新一轮审核评估所设计的分类评估体系将为高校教育教学植入新的质量文化基因，引导高等教育在分类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提高质量。

高质量高等教育可能通过高校按部就班的教育教学实践来实现，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且不确定性很大。质量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进取性的高等教育发展行动，它所追求的就是在较短时间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质量文化建设往往是目的明确、行动有力的高等教育活动或治理活动，它不仅要求在短期内取得实际成效，而且要求将新的文化基因加以有机融合，创新高等教育文化，从而奠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牢固基础。

2.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高校，影响却不只在高等教育内部，还会辐射到社会各个方面。民众所需要的不是劣质的高等教育，社会企事业单位也不欢迎低劣的高等教育“产品”，所以，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

(1)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面对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与精英化阶段相比，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各界关注。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加快，规模增长几乎直线上升。据统计，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到2019年，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914.90万人，增长744.3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76%增长到51.60%，增幅达到41.84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幅度不仅对高教界产生了重大冲击，令人们对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产生怀疑，而且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信任危机，主要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疑虑加重，对高等教育发展持消极态度。高教界既需要自省，以强大的定力和创新的精神维护高等教育发展局面，营造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态势，又需要自强，以积极的状态和正面的形象回应社会各界关切，呵护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主动作为、回应社会关切的有效手段。只有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要求，创新发展质量文化，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质量奠基，才能化解社会各界的质疑，树立良好的社会声誉。21世纪以来，我国高教界一方面加强了对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提出了多元质量观、应用型高等教育理念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加强了高职院校建设和应用型高校建设，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引入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这些建设工作的推进，既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向多元化转型，又在文化意义上创新了高等教育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社会关切倒逼高教界开展了质量文化建设。

(2)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校满足人民群众高等教育需求的责任担当。

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不只是为了让民众有学上，还要让民众上好学，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高校发展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高校办学和发展的任务是不同的。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40

所，比1998年净增1718所，增长168.10%。这就是说，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历史不到20年，新建高校占多数，积累少，质量文化薄弱。另外，统计表明，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为340.87万人，到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3031.53万人，2019年比1998年增加2690.66万人，增长789.35%。满足新增数以千万计民众的高质量教育需求，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质量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受益者主要是学生。学生受教育质量不能保证，质量文化建设就是玩虚招、瞎折腾，浪费人力物力，难言高等教育有质量。针对新建高校多、扩招数量大的实际情况，从保证底线质量的要求出发，我国组织开展了新建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高职高专院校办学水平评估，重点解决两类高校的基本办学条件缺口问题和教育教学工作秩序混乱问题。近20年来，新建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以评建为抓手，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加强了师资队伍，基本配齐补足了办学条件，改善了办学环境，健全了教育教学制度，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评建文化已经在高校初步扎根，评估认证已经成为高校谋求更好发展、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评建文化的形成是高校办学走向正规化、办学质量得到社会认可不可缺少的条件。

(3) 质量文化建设是展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显示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活动，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母机”，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不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所培养的人这个中介来完成的。不仅如此，其社会功能不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具有长期性和发散性。所谓长期性，是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作用，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逐步体现出来。有的大学排行榜将毕业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等科技成就奖者作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或贡献的主要指标，其实，从毕业到获奖常常需要数十年时间。在这数十年中，有太多的因素可能影响毕业生的社会成就，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发散性，是指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很多方面。很多调查表明，毕

业生在不同行业部门职业岗位流动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所从事的很多岗位或职业与他们所学习的专业往往关系不大，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关系。所以，考察或评判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并非易事。

质量文化建设是高教界展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显示屏”。质量文化建设项目实施的影响不只在高教界内部，它同时也会延伸到外部，向社会宣示高教界追求高等教育质量的决心和行动。近年来，我国高教界试点实施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师范类专业认证和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认证要求相关专业教育贯彻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把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教学相关联，对相关专业教育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评价，以推动各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这些认证工作的开展既使高校相关专业办学目标更加明确，教育教学工作更加规范可查，人才培养质量更有保障，同时也使社会有关方面更理解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与要求，更清晰地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情况，尤其是社会有关行业部门专业人员参与认证工作，更是将社会生产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带入了高等教育，促进了高教界与社会有关方面的有机互动。以往人们常常把高等教育质量看作一只黑箱，比喻无法透视质量的生成过程，有了质量文化建设，社会有关方面就可以从高校人才培养过程考察高等教育是否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策略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它以形成新的质量文化，淘汰过时的质量文化为直接目标，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不单是高校的责任，政府、社会有关方面应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质量文化建设的内容丰富而多样，各高校校情不同，教育教学的具体使命和任务各异，质量文化建设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存在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向普及化的中高级阶段推进，高校必须担负起保证质量的使命，展现责任担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建设和发展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关于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出推进和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要求，既体现了政府对质量文化建设的关注和重视，又表现出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核心价值

任何质量文化都包含理念、信念和价值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正是这些决定了质量文化的性质和表现方式。传统上，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理念、信念和价值主要是关于知识和教师无可替代、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知识中心和教师中心是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尽管在观念上和政策文件中学生中心已司空见惯，很多教师把学生中心作为谈论教育教学改革的口头禅，但在实际工作中，学生中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没有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价值。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还是传统的，质量文化建设必须解决核心价值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基本性质。

学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又是目的所在。一切高等教育质量及质量文化最终都要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学生中心是现代高等教育价值与传统高等教育价值的分水岭，遵循学生中心原则，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必须从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出发，落实学生主体地位，构建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发展质量。从根本上讲，质量文化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让学生爱学习、会学习、要学习上，如果不能解决学生学习认知和信念、学习方法和行为以及学习成效问题，质量文化建设是无效的。

落实学生中心原则，需要质量建设主体多方面协同行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等教育政策、行动都要以学生为中心，落实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将学生中心原则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使服务学生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统一起来，以凸显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核心地位。高校必须践行学生中心理念，办学定位与发展愿景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课程教学改革、社会合作与国际交流、教学环境条件更新等都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发展质量为准绳，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应当把学生作为出发点，在评估和认证原则与标准中牢固确立学生中心原则，所有关于高校教育教学的评估和认证都应把考查学生中心地位和学生发展质量放在首位，使学生中心价值理念在评估和认证中沉淀下来，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价值。

2. 打造基于高校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

质量文化建设是有组织的行为。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多元的，有高校、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主体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关注质量的侧重点不同，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是存在差别的。高校是质量建设的直接主体，也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质量文化建设的承接者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质量文化建设需要通过高校的接受和消化，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新内涵。由于各主体间复杂的行政和治理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主体的单打独斗行为，而是相互合作、共同用力的行动。所以，开展质量文化建设，必须健全合理有效的组织体系，使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主体能够有机关联起来，有条不紊地行动，使各方的努力形成合力，最终达到丰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内涵，创新质量文化形式的目标，从而切实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它可以自己组织开展质量文化建设，这是它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的本分，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转型阶段的“必修课”。只有通过质量文化建设，高校才能逐步消解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创新质量文化内涵，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政府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又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者和引导者，政府对质量和质量文化的重视常常会转化为高等教育政策和改革行动，质量文化建设常常体现在各种相关政策导向和改革举措的实施上。其他社会组织既可以独立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也可以联合高校或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相关质量建设行动。尽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上的作用是重要而显著的，但他们的作用必须通过高校才能发挥实质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还扮演着质量文化建设的中介者角色。尽管不同组织进行质量文化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同，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和攸关的利益存在差别，它们在质量文化建设中所秉承的价值原则是不同的。建立相互关联、导向积极、以高校为基础的质量建设组织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组织体系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其目的在于强化质量攸关的共同精神信念，构建不断提升的质量文化共同体，形成共同参与的质量建设

合力。高校是这一组织体系的基础，这是由高校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在质量文化建设组织体系中，高校既扮演着直接的建设者角色，又扮演着承接并转化其他主体质量文化建设影响的中介者角色，还扮演着与其他主体共同建设质量文化的合作者角色。这不仅需要高校的自觉，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承认和尊重高校的角色。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发挥积极的建设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作用，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提供政策动议、法律规范、行政指导和经费支持。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组织，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具有领导高校的职能，所以，政府对高校的质量文化建设具有领导之责。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也可以发挥建设者的作用。作为建设者，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与高校加强协同合作，将社会行业产业部门和公众的质量意愿带入质量文化建设中，丰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价值，增强质量文化的社会适应性。组织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在于制度，高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要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角度推进质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将质量保障落实到制度上。

3. 构建内外结合、合作共治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保障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它包含一系列行动，比如，评估、认证、状态数据监控、审核（或审计）、绩效考核、发布质量报告和排行榜等。这些行动可以由高校发动和组织开展，也可以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推动和组织开展，还可以由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大体而言，这些质量保障活动可以划分为内部质量保障和外部质量保障，内部质量保障是由高校组织开展的，外部质量保障是由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不论是内部质量保障还是外部质量保障，它们的目标指向都是一致的，即改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内部质量保障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基石。高校开展内部质量保障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只要高校开展高等教育活动，就离不开质量保障。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高校办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并不紧密，高校的自主性很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是高校的事情。高校组织开展的质量保障主要是通过背诵、演讲、辩论、问答等考试考查活动实现的，外部组织甚少干预或参与。尽管在精英化后期，有些国家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审核、统考测验等质量保障活动，但内部

质量保障还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方式。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尽管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但高校的内部质量保障仍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高校的中介者角色更强化了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作用。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应当更好地发挥内部质量保障的作用，高校应当牢固树立质量文化意识，高度重视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将质量保障的根基植于学科专业教育教学过程，将学生本位、持续改进和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融入办学各方面和全过程。

外部质量保障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质量建设与关切活动。应当承认，外部质量保障与高校的质量追求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但这并不说明可以忽视或无视外部质量保障。实际上，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高，外部质量保障发挥的作用就越重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发挥外部质量保障的作用，建立内外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作用机制，以达到在保证底线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高校应当主动接受和吸纳外部质量保障理念，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质量文化价值，吸收外部质量文化价值，形成与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需求相适应的质量文化。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拥有广泛的社会治理权，它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的所有行动都是直接针对高校的，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直接性和权威性。因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在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从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组织开展多样化的质量保障活动，利用政策法规和资源配置杠杆，引导高校增强质量意识，校正办学定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其他社会组织的质量保障活动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与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和质量审核与认证，将自身的质量诉求反映到高校办学中去，并通过一定的质量控制机制影响高等教育质量，这种质量保障就是直接的。它们还可以完全自主地开展各种研究、认证、排名活动，面向社会发布质量研究报告、认证结论或排行榜，供社会各界和民众参考，高校也可以借鉴这些活动的结果，在自身办学过程中加以运用，这样的质量保障就是间接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他社会组织都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出发，开展各种质量保障活动，对高等教育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建构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质量文化建设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在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基础上进行的旨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努力。基础不好不牢，质量文化建设只能是亡羊补牢，作用有限。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在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基础好了，就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开展质量文化建设，争取更好的建设成效。

高等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长时期的沉淀和积累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办学的必要条件。只要经费条件有保证，科研人员水平高，科研工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但高等教育却是一个“慢工活”，积累不足就会基础不牢，质量难有保障。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历史不长，加之办学之初因陋就简，缺乏周密系统的规划设计，投入和资源保障有限，高等教育文化积累不足。因此，在加强质量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重视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双管齐下，开创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规模与质量统一、形式与内涵兼备，发展大规模、高质量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应当进一步调整和拓展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开拓新的布局，实施与大众化和普及化深度推进相适应的区域重点支持政策，扩大高等教育容量，为更多民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开辟新的空间。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办学机制，为非传统生源工学兼顾进入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提升技术支持能力，发展线上高等教育，支持虚拟大学办学，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学体系。进一步加强学情研究，以学习者为中心，改革教育教学模式，优化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適切性，发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办学资源筹措能力，改革资源配置政策与方法，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社会资本和私人投入相结合的资源保障机制，全面改善高等教育办学条件，以优越的办学条件和环境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展高等教育文化培育，以新理念新思想指导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以高校学科文化建设和组织文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文化培育，打造与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文化，为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政策解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工作答记者问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请简要介绍《评价办法》出台的背景。

答：成效评价事关建设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为“双一流”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建设期末，要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价。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把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任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相关文件要求，2018年6月，教育部成立专门工作组，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学者和高校“双一流”建设负责同志等，统筹推进研制工作。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精神、对建设高校开展全覆盖式调研、征询“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意见，以及征求建设高校、相关部委、部内司局意见建议等方式，经反复研究论证、修改完善，最终形成《评价办法》。

2. 成效评价的基本定位和特征是什么？

答：成效评价是对建设高校及其学科实现大学功能、内涵发展及特色发展的多元多维评价，其设计与大学排名、学科评估及绩效评价等有显著不同。其基本定位和特征是：

第一，注重体系性。在评价内容上，涵盖“双一流”建设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考察期末建设达成度、发展度和第三方评价表现度，呈现高校和学科的总体建设成效。在评价手段上，设立常态化建设监测体系，探索形成监测、改进与评价“三位一体”评价模式，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围绕特色提升质量和竞争力，在不同领域和方向建成一流。

第二，注重诊断性。成效评价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聚焦内涵建设，突出服务贡献，强化诊断功能和以评促建，综合呈现高校自我评价、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结果，不计算总分，不发布排名，不是简单的水平评估。

第三，注重集成性。成效评价依托专家，根据监测数据、部内司局数据、第三方数据，开展定量数据处理、定性评估、第三方评价结果比对等工作，把建设情况综合呈现出来，督促高校落实建设主体责任，治本纠偏，持续提高建设水平。

第四，注重发展性。教育评价是一项世界级、历史性和实践性课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调整完善。

3. 成效评价在“破五唯”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成效评价将“破五唯”要求贯穿全方位、全过程和各方面，注重体现“双一流”建设本质要求，充分体现“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改革导向。

一是开展多元多维多主体评价。坚持评价视角多元、评价内容多维，统筹自我评价、专家评价、第三方评价，按不同评价方面、不同学校和学科类型，以区间和梯度分布等形式，呈现建设高校和学科的综合评价结果。

二是突出质量、服务和贡献。坚决摒弃数论文、数帽子的做法，避免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变化作为评价指标。在人才培养评价中，突出学生代表作、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等结果。在师资队伍建设评价中，重点考察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投入、社会服务贡献等。

三是优化评价手段和方法。实行水平评价与效益考核相结合、日常动态监测与周期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议相结合，以动态监测积累的过程信息与数据为主要支撑，既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指标数据，也组织专家进行定性评议，既考察现有实力，也衡量在已有发展基础上的成长性及发展潜力，建设周期内尽量减少评价对学校的干扰，综合考察高校和学科的建设成效。

四是积极探索新的评价方式。探索建设成效国际比较，结合大数据分析和同行评议等，对建设高校和学科在全球同类院校相关可比领域的表现、影响力、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考察。适时开展分类评价，研究建立建设高校分类体系，完善分类评价办法，引导和鼓励高校与学科在发展中突出优势，注重特色建设。

4. 成效评价考察内容的框架是什么？

答：成效评价由大学整体建设评价和学科建设评价两部分组成，均按“前置维度+核心维度+评价视角”方式布局考核内容。

前置维度考察建设高校“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治理体系改革成效”，贯穿成效评价各个方面，反映学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党建引领和保障“双一流”建设、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等方面的表现。

核心性维度是“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的集中综合反映。大学整体建设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学科建设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

评价视角分为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分别考察达成水平、建设周期内水平变化、发展潜力，重视对成长性、特色性发展的评价，引导高校和学科关注长远发展。

5. 成效评价的程序设置是怎样的？

答：成效评价按以下程序进行。一是建设高校根据各自建设方案对建设情况进行中期和期末自评；二是教育部根据《评价办法》制定成效评价工作方案，委托相关机构分别开展定量数据处理、定性评议、第三方评价结果比对等工作，有关机构分别提出初步评价结果；三是“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中期和期末自评报告、相关机构初步评价结果，形成综合评价意见；

四是“双一流”建设主管部门根据专家委员会的评价意见，综合研究，确定评价结果，上报国务院。

6. 成效评价的结果如何运用？

答：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建设范围动态调整的主要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减少支持力度，切实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凝练特色、内涵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高校自评、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的结果，还是综合评价的结果，都不是高校或学科建成一流与否的评判。对“双一流”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认识。“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服务国家需求，坚持久久为功，把精力聚焦到人才培养上、放在建设项目上，踏踏实实开展建设，用服务贡献的实绩体现特色、增强实力、展现水平，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发挥应有的引领示范作用。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1-3-23）

☆高教视点

破“五唯”后，高校职称评审如何才能更见实效

2020年12月31日，人社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前高校职称评审中广为诟病的各种重科研轻教学、重形式轻内容、唯量化指标等突出问题，《意见》明确提出要“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也即近期备受关注的破“五唯”问题。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既是关涉国家教育现代化、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涉广大高校教师安身立命的重要议题。破“五唯”后，围绕《意见》，在高校层面职称评审改革如何有效展开？这是当前各高校在具体落实《意见》，实现改革平稳进行必须回应的问题。

“每个人都是变革的动力”。一项改革的顺利实施，高支持的实践环境不可或缺。如前文所言，职称改革是关涉教师安身立命的问题，高校教师是这次职称制度改革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各高校在落实探索本校改革方案过程中，广泛动员、积极听取教师意见，让教师能切实理解本次改革的意义并统一认识，是本次改革得以顺利且有效推行的前提。

现代大学之功用在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做项目、发表论文本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工作题中应有之义，本身并非问题。真正构成问题的是简单把立项多少、论文多寡等数量化指标当成了裁量教师的唯一标尺。当前的高校教师评价管理设计，基本上是遵循新管理主义的路数按照量化评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形式化、标准化的精确计算打分、评价、奖惩，即使是意在质量考量的内容也简化为是否英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引用率、转载率、项目立项级别等抽象的指标。在这样“数量导向”为特征的评价框架下，对形式的追求完全遮蔽了对内容的关心，大学功用的丰富性也被极大压缩——破“五唯”之“唯”的问题也正是在此。基于此，很显然，不“唯”并非“不要”，而是需要从根本上实现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的转变，这包括对研究成果质量与教育教学质量的转向，而与对教育教学质量重视相一致的是教师的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被放到了评价标准的首要位置。

“数量导向”，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追求理性化的结果，有其理论上的合法性，精确计算是万事之基础——这是理性化最原始的含义。用看起来最无可争议的数据直观呈现结果，一定程度避免了各种人情因素的干扰，简单清晰且容易彰显公平，便于操作，所以长期备受管理者青睐。而恰恰因为“数量”的简单清晰，它难以传递出高校教师工作的内在复杂性以及评价过程的复杂部分。相反，“质量导向”强调回到对教师工作内在内容与过程的考查评价，有利于高校工作回归注重质量、实效与贡献的正轨。但是坚持“质量导向”面对的难题则是：评价标准是什么？谁来评价？

在《意见》中，针对科研成果评价由数量转向质量的意见提出的具体方案包括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与同行专家评议机制。但其实，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和同行专家评议制在不少高校（包括本人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早已经在实行，但

什么才算得上“代表性”成果？以及为什么有的学校规定代表性成果是3份，而有的规定是3到5份，这样的数量设定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至于同行评审专家怎么遴选出来？怎么确保同行评审专家评议意见的可靠性？对于评审专家有异议怎么申述？可能多数老师对以上问题都并不太清楚答案。如果说之前的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以及同行专家评议机制还仅仅是部分高校自行在原有“数量导向”评价机制下的补充或尝试，其本身也只是参考，并不构成对职称评审的实质性的影响而可以忽略以上问题，那如今，这些问题就是实实在在摆在了各高校面前。如何在破“五唯”后，拿出一个让广大教师信服的科研评价方案？由于质量导向的评价通常缺乏一个外在量化标准作为客观参照，而不同类型高校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上定位不同，而在当下学科细分之下，不同学科亦有不同特征，因此，各高校依据学校自身类别层次、学科特色进行岗位设置，因校制宜制定评价方案，开展分类评价、小同行评价都显得尤为必要。同时，在高校层面，完善专家遴选标准、严格规范评价程序是落实同行评审，达成公平公正评价的重要环节。而《意见》在更宏观层面提出建立完善评审专家诚信记录等制度以提高职称评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更显必要。

在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考核与加强教学质量评价方面亦面临同样的问题——评价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谁来评价？

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在过往的职称评审中也都有强调，但实际操作中因为缺乏抓手而成为评价中的短板，基本上只要没有严格意义上违规违纪就过去了。针对《意见》所提出的“完善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考核办法，健全评价标准、体系及考核方案，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还需要专门研究，制定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

教书育人本是高校最天经地义之事，但在职称评审制度中长期被边缘化，职称评审中所涉及之处也多限于避重就轻的对基本教学工作量的评核，而对质量则难有实质性考量。让高校育人功能彰显，重新强调教学在职称评审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导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意见》的基础上，高校可以从对不同岗位类型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的规定、教师基本上课纪律规范、教学研究的参与及成果、课堂教学效果等几个环节入手设计评价方案。其中，课堂教学评价可能是最难实

施的，在目前课堂教学多采用学生评价的方式，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参与者，其评价当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鉴于学生作为利益相关者在评价中可能受一些功利性因素的影响而使评价结果失之偏颇，对此，一方面需要在教学评估问卷的设计更科学合理上着力，另一方面纳入同行专家的评价也是至为重要。但这里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如何在评价的同时，保证高校教师的教学专业自主空间，不让教学评价成为限制教师的紧箍咒。

本次高校职称制度改革，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重形式到重内容与过程，从重科研的单一评价到重育人的多元评价，是教育评价导向上的重大转变。围绕《意见》，高校在具体展开中应从学校实际出发，针对职称评审中的既有突出矛盾，完善评价标准、探索创新评聘形式，通过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增强教师获得感、激发高校教师活力，建设一支高质量人才队伍，营造良好的校园学术生态与育人生态。（罗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4月6日14版）

“七问”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教师队伍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育人水平、创新能力的高低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深刻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青年教师如何面对“非升即走”压力？评聘时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师德门槛如何变为“硬杠杆”？1月底，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引起了广大高校教师和高教界专家的热议。光明日报特别邀请来自不同地区、专业高校教师代表及网友就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困惑向高等教育专家和知名院校领导提问寻求解答。

“预聘—长聘”制下如何稳定教师预期

1. “非升即走”带来的不确定如何面对？

■ 教师困惑：

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教师花阳：我注意到《指导意见》提出加快高校教师编制岗位管理改革，实行实施岗位聘期制管理，进一步探索准聘与长聘相结合等管理方式，落实和完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聘用机制。按岗聘任，没有了之前职称所赋有的身份象征意义与地位内涵，教师又如何获得一种职业认同感、尊严感与稳定感？聘任合同的限期约束与“非升即走”制度，是否会增加教师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优秀人才的加盟？

■专家解答：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廷洲：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发源于1986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已相对成熟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职称制度改革同样可以追溯到1986年，明确要求专业技术职称不同于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且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准聘—长聘”制度的实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学术生涯早期强调竞争淘汰，在后期强调职业保护。有学者认为，这种改革使得传统高校教师身份内涵和职务终身制观念与意识日趋淡化，曾长期存在的单位依附、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等顽瘴痼疾逐步解决，但它同时具有明显的行政驱动和市场逻辑，对高校的学术组织属性、高校教师的工作特点和学术研究的规律重视不够。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人事制度改革是否会影响优秀人才的加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改革使得高校教师从一个高度稳定、依靠自我价值驱动的职业逐渐变成一个存在更多竞争和挑战的职业。

2. 高压之下职业成长怎么办？

■教师困惑：

花阳：个人感觉周围大部分青年教师聘期压力较大，不少高校对每位新进青年教师都有很高的科研成果与国家项目申报的考核要求，还有教学和公益要求。《指导意见》也提出高校要健全教师发展体系，完善教师发展培训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制度和督导制度，营造有利于教师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环境。在“高要求”之下如何更好地为“青椒”们提供深入关心和引导？

■专家解答：

李廷洲：《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不把出国（境）学习经历、专利数量和对论文的索引、收录、引用等指标要求作为限制性条件”“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探索长周期评价”。可以预见，各个高校的教师评价制度将作出改变，单纯强调量化指标和刚性要求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种回归育人规律和科研规律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师德“硬杠杆”如何强化

3. 师德师风可以量化吗？

■ 教师困惑：

塔里木大学教授吴翠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颁布如何将师德这一“硬杠杆”落实，引导广大教师育人先育己、立教先立德？

■ 专家解答：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考核评价体系，校院两级联动，注重依托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客观细致准确地评价教师师德师风表现，完善考察反馈监督机制。二要将教书育人、思政育人成效作为教师评价体系改革的根本出发点。高校要按照《意见》要求，加强评价指标的导向性设计，强化教师思政教育要求，同时把注重教学与思政工作质量、育人成效作为考察与评价的首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切实践行立德树人初心。

4. 评聘争议能否寻求法律救济？

■ 教师困惑：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嵩天：评聘过程中难免出现相关争议，是否具备有效的行政与法律救济制度予以支持？长聘的门槛和标准如何确定，如何兼顾在旧体制下已经获得高级职级的教师？

■ 专家解答：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合文：对于评聘过程中出现的争议，一方面需要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调整，在《高等教育法》《劳动法》《教师法》修订中结合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行政与法律救济制度，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弘扬正能量。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还未修订之前，各个高校在推进准聘—长聘制时，应该建立专门的申诉救济体系来解决相关争议。

长聘的标准需要在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结合学校定位、岗位性质进行科学设置，在全面听取学生、教师、同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之后进行充分论证，做到激发教师活力与保护教师权益的有机结合。

准聘—长聘制的实施要体现灵活性的原则，既要用于创新，也要考虑历史延续。这一制度的实施要有过渡期，过渡期内要给予教师选择权，并考虑学科差异和学校差异，不宜一刀切。按照旧体制已经获得高级职级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个人规划进行选择，愿意承担风险获得高薪酬的可以选择进入新制度，愿意平稳发展的可以选择旧体制。这两种选择可以打通，选择旧体制但达到高标准的可以按照新制度进行补偿。

西部高校如何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5. 西部高校如何留住人，吸引人？

■教师困惑：

吴翠云：近年来，西部地区一些省区高校无论是紧缺还是一般专业都很难招进来合适的博士，但在东部地区却出现了博士当辅导员、实验室助理人员的现象。对于西部边疆偏远地区的高校，在地方院校、地方政府层面有相应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国家能否出台一些针对性政策来进一步稳定教师队伍，拓宽人才引进的渠道？

■专家解答：

吴合文：针对东西人才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除了目前在国家级人才选拔中倾斜西部、在国家级项目评审中设置西部专项之外，国家还应出台更能激发西部高校人才内生动力政策。比如，制定激励性政策吸引企业、个人向西部高校捐资，设置灵活的特聘教师岗位，岗位性质和任务由相应高校根据区域需求和高校定位

与发展规划进行设置，同时中央政府应破除省属和部属的区分政策，按照更高比例提供配套资金。

如何科学规范设岗，促进教学与科研

6. 岗位资源怎么分配？

■教师困惑：

嵩天：《指导意见》提出高校依法采取多元化聘用方式自主灵活用人，统筹用好编制资源，优先保障教学科研需求，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重要管理岗位倾斜。合理设置教职员岗位结构比例，加强职员队伍建设。在有限的编制额度内，究竟应如何更好地分配岗位资源？

■专家解答：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王果胜：设岗应当以学校事业发展为导向，解决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学院的布局、学科结构的调整，是编制改革的重要依据。从学校内部自身发展来说，学校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建设、师资学缘结构和国际化水平、队伍的总体活力及机制驱动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人事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补短板，这些都是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内生需求。人事改革的核心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制度，完善岗位评聘和考核制度，建立以人为本的激励制度体系，充分激发教职员工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建设一流的教职员队伍，形成人尽其才、人尽其责、人人奋进的局面，推动学校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

7. 不起眼的“小工作”能得到肯定吗？

■教师困惑：

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菲：创新离不开底层运维工作，如何更好地通过制度建设、科学设岗评价运行维护、服务支撑等底层工作和教师的公共服务的价值，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价值得到肯定？

■专家解答：

王果胜：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事制度改革要通过编制制度改革、招聘制度改革、评聘制度改革、考核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才能调动每一位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要改革编制制度，完成从编制管理向人员总量管理转变、从身份

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从封闭管理向开放式管理转变；多角度改进职称评审办法，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实现激发教职工内生动力、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的目标；明确岗位基本职责、考核共性标准，放权学院制定考核细则，发挥学院的主体责任和教师的主动性，建立学校、学院与教师个体考核评价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实现在岗有责、人人尽责、人岗相适；完善薪酬体系，实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目标。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30日14版）

为地方高校指明办学方向

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江学院考察调研时的重要指示，让人们对闽江学院“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有了更深理解。这一理念是习近平同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福州工作期间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时提出的，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既体现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更指明了广大地方高校的办学方向。贯彻落实这一办学理念，必须做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等教育要站在民族未来的战略高度，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育人的根本问题来抓。大学生在学期间要注重打好人生基础，健全理想信念，增强社会适应性，好好学做人、学本领，以适应社会需要赢得尊重。地方高校要瞄准社会需要培养适用人才，使学生学好本领为国效力、奋斗创新担当责任。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适应每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等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新时代中国教育已发生格局性变化，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最终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面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世界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不创新只能原地踏步，创新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动能。地方高校要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努力增强教育支

撑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注重解决地方经济社会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

彰显应用型办学特色。应用型是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理念，决定着高校的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模式，其特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是服务，地方高校当以区域繁荣发展为己任，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开展育人和科研工作，把办学特色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把应用研究和人才服务结合起来；其二是融入，高等学校有责任利用自身优势融入地方产业发展，融入乡村振兴，主动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帮助农村发展新型农业和生态产业。其三是模式，地方高校要积极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的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

彰显应用型办学特色。应用型是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理念，决定着高校的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模式，其特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是服务，地方高校当以区域繁荣发展为己任，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开展育人和科研工作，把办学特色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把应用研究和人才服务结合起来；其二是融入，高等学校有责任利用自身优势融入地方产业发展，融入乡村振兴，主动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帮助农村发展新型农业和生态产业。其三是模式，地方高校要积极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的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面向未来，我国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应用型办学，深化产教融合，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迎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养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3月31日9版）

☆高校动态

东北石油大学：多措并举让毕业生求职更安心

“孩子念了4年大学，能顺利就业是我们家长最大的心愿，感谢学校领导老师为我们支招解惑，孩子的就业前景明朗了，我们做家长的也放心了。”日前，东北石油大学举办“家校携手、共话未来”2021届毕业生家长云上见面会。会上，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学院辅导员及已经求职成功的毕业生分别介绍了就业形势和就业情况，分享了成功求职的案例和经验，并就毕业生及家长关心的就业问题进行解答。

东北石油大学党委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坚定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春季开学以来，为抢占“金三银四”先机，给毕业生争取更多就业资源，该校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按照全省就业工作调度视频会议要求，第一时间恢复开展线下宣讲会、招聘会等各类招聘活动，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力促进2021届毕业生就业。

在东北石油大学春季第一次双选会上，107家用人单位来到学校选人，提供就业岗位1943个、招聘人数达9555人，数百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签约意向。为了促进毕业生留省就业，东北石油大学与鸡西市麻山区委合作提供240个政策性就业岗位。同时，为助力女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学校还携手大庆市妇联举办了“东北石油大学2021届毕业生‘春风送岗·职因你来’暨女大学生专场线上双选会”，提供就业岗位527个，招聘人数达12091人。

截至目前，东北石油大学已累计开展企业专场宣讲会87场，4月9日、4月23日，东北石油大学还将分别召开2021届毕业生春季第二场、第三场线下双选会。（作者：曹曦 许丽娜）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4-2）

中国政法大学等 13 所高校实现思政课程共享

近日，全国高校院（系）立德树人知行联盟积极开展思政“全”课堂建设，首批思政“全”课堂推出了 11 个院系的 11 门课程，涵盖了管理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医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联盟内学生可通过中国慕课、智慧树等平台或者课程视频进行线上学习，成绩互通、学分互认，力求达到多学科、多角度、系统性的课程育人效果。

2019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等 13 所学院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协同论坛，共同倡议成立“全国高校院（系）立德树人知行联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欣卉认为，通过思政“全”课堂的学习，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在课程平台上能和不同学校的同学们互动和学习。

思政“全”课堂由联盟内学院根据自身特色打造，充分发挥好专业课教师“主力军”、专业课教学“主战场”、专业课课堂“主渠道”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开设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课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线索，结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宪法、环境司法、环境健康法治等法学专业教学，让学生从法学视角更加系统深入地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北京交通电子信息学院推出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中的工程伦理探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将专业素养教育与社会主义工程道德教育有机结合，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工程项目建设者提供价值观层面的全面支撑与保障。

据介绍，联盟将持续开展制度创新，积极优化内容供给，不断提高授课质量，继续推进课程体系共建与课程资源共享，探索打造体系性课程育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3-30）